

时空社会学在中国的兴起

景天魁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回顾自20世纪末以来时空社会学在中国成长为一个新兴学科的历程就会发现, 时空社会学在中国得以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崛起过程召唤从时间性和空间性上对之予以刻画和解释, 要求时空社会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描述和分析的基础性框架。同时, 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也必须倚重于时空转换。面对新时代、新实践的召唤, 通过对“社会加速理论”的讨论, 可以从方法论上对中国的时空社会学研究如何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一种可行解释路径。

[关键词] 时间性; 空间性; 社会加速; 时空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 C 9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18)02-0010-07

[DOI] 10.16783/j.cnki.nwnus.2018.02.002

随着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脚步越来越铿锵有力, 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也就越来越增强。在此背景下, 中国学术也勇立潮头, 展现了各个学科竞相争妍的可喜局面。本文所谈的时空社会学,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由点滴雨露, 汇成涓涓细流, 融入奔腾东去的学术洪流的。

一、时空社会学在中国迅速成长为一个新兴学科

时空社会学是从时间和空间特别是社会时空的特性和视角出发, 运用时空分析方法, 研究社会的结构和过程的一门分支社会学。在国外, 社会学开展时空研究基本上是领先于其他学科的, 但在国内, 却落后于哲学、文学和经济学等学科。这可能与我国社会学在改革开放之初才开始恢复重建, 而时空社会学这种综合性较强的新兴分支学科一时难以开展有关。但在20世纪末, 时空社会学研究在中国登场以后, 发展却很迅速。只过了几年, 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就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公开发表。此后, 不仅优秀成果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更为可喜的是作者大多为年青人, 这预示着发展的后劲会是很足的。

受这种发展形势的鼓舞, 2006年10月, 笔者和北京师范大学朱红文教授利用同时到剑桥大学访问的机会, 在英国专家的帮助下, 精选了英、法、德等国学者有影响的时空社会学专著十本, 于2009年以来出版了国内首套《时空社会学译丛》。^①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 时空社会学研究成果不仅以更高的频率大量涌现, 而且研究态势出现了几个突出特点: 第一, 从介绍性、模仿性研究, 转变为自主创新性研究, 更加坚定地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 第二, 到2012年, 我和何健、邓万春、顾金土合著《时空社会学: 理论和方法》^[1]的出版, 也表明时空社会学从特定视角的经验性研究进入到系统的学理性研究; 第三, 研究队伍迅速壮大, 研究方式也从单一的散兵游勇式推进的研究, 发展到研究团队协调式推进的研究; 第四, 吸引了相邻学科学者的关注和参与, 哲学、人类学、文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各路大军相互支援、相互启发, 开始形成广阔的学术平台。

2013年,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人文杂志》推出了国内首个时空社会学专题, 该专题推出三篇文章, 分别是笔者的《时空社会学: 一门前景无限的

[收稿日期] 2017-11-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时空社会学: 拓展与创新”(2016WK021)

[作者简介] 景天魁(1943—), 男, 山东蓬莱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从事福利社会学、时空社会学和社会学理论研究

学科》、邓万春的《时间、空间与社会理论重构的谱系》和顾金土的《社会时空分析的类型、范例及特点》，这些文章陆续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重要报刊转载。2014年，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主办了首届时空社会学论坛。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先后于2015年与北京工业大学合作、2016年与中国传媒大学合作、2017年与山东大学合作，分别主办了第二届、第三届和第四届时空社会学论坛，参会人数和提交论文数逐年增加，这表明时空社会学研究在中国已经具有相当的阵容和声势。而中国社会学会即将成立时空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则标志着时空社会学已经成为近年来发展最为迅猛的社会学分支学科之一。

二、时空社会学适应刻画与解释中国崛起过程的需要

时空社会学在中国得以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崛起过程召唤从时间性和空间性上对之予以刻画和解释。重大的历史变革有可能在时间性和空间性上出现基础性的变化或“特色”。例如，从牛顿力学的绝对时空到爱因斯坦的相对时空，标志着物理学的革命。而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时间和空间不再仅仅是外在的“坐标”，而成为内在的基本变量，时空特征变化会成为解释社会变迁的重要原因。因此，1999年我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2]一文时，就不是在地理空间和自然时间的意义上使用时空概念的，而是将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作为社会时空的基本内涵，以三者的不同关系定义时空压缩和超越进化这两个核心概念，以此刻画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认为这一历史过程的根本特点是“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压缩在同一时空之中”，三者不是取代关系而是包容关系，三者的统一过程是制度机制创新的过程——这构成了“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基本含义。其他一些时空社会学的理论性研究，也致力于形成理解中国现代化、分析我国社会变迁的新社会时空视角，使之从多角度、多层面的探索性研究走向这一学科研究范式的定型化。

另一方面，许多作者敏锐地把握到中国崛起过程的鲜活经验，并开展了异彩纷呈的时空社会学经验性研究，这些研究聚焦于进入深化改革关键时期时空背景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运用时

空社会学的视角与方法，从多领域、多视角、多维度研究社会运行和发展中的具体问题，使时空社会学在中国呈现出蓬勃生气，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国内学者也及时发表了一些很有创新性的论文。例如，邓志强的《网络时代社会认同的时空转换——基于时空社会学的分析视角》^[3]一文认为，网络时代社会认同的情境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认同的时间发生了意义的转变，认同的空间出现了场域的转换。时空特性给网络时代的社会认同带来了不确定性，甚至产生了认同的危机。王星在《国家、工厂体制与空间营造——外出农民工城市居住选择的一个理论分析框架》^[4]一文中，从空间营造角度分析了农民工城市居住选择问题，指出在制定农民工住房政策时，关注其主体性、提升其可行能力远比简单改善其居住质量更为重要。黄晓星、郑姝莉的《作为道德秩序的空间秩序——资本、信仰与村治交融的村落规划故事》^[5]分析村落空间生产与社区秩序的再造方式，认为空间是乡村社区重构与划界的基础，空间秩序本质上是一种社区道德秩序，是资本、信仰与村治交融互动的结果。马玉娜、顾佳峰在《省际公共养老福利资源配置研究——兼论空间与制度结构的影响》^[6]一文中发现，家庭、经济、社会等制度性结构因素和空间结构因素对县级社会福利院床位资源配置都有显著影响，若不考虑空间结构因素，制度结构对社会福利院床位配置影响作用的分析会出现偏差，同时，邻近县之间的社会福利院床位配置也存在相互影响，由此提出“空间—制度”的二重结构论，弥补了制度决定论对公共福利资源配置分析的不足。李英飞的《资金短缺下市场如何运作——浦镇轻纺产业链中的社会时间机制》^[7]，通过引入社会时间机制来说明，在资金短缺条件下，作为市场主体的中小企业，如何借助生产链上的大规模逐级“欠账”和成本分摊来实现融资和持续运转，由以解释无第三方信用担保的交易双方，如何借助社会时间机制形成的资金结算周期来适应和促进整个市场运作和发展。

以上几个例子，就涉及到了网络社会、城市居住、乡村规划、福利资源配置和企业经营诸多方面，借助于时空基础使时空研究展示出宽广领域和勃勃生机。这些以及其他许多未及提到的经验性研究成果都展现出时空视角的独特透视力。

上述研究表明，时空社会学研究在中国的初创阶段，就积极呼应并且适合于中国社会现代化和中

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客观需要。聚焦到一点，就是致力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描述和分析的基础性框架。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要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将近 40 年的努力，我们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为时空社会学开拓了广阔天地。社会学怎样描述和刻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我在 2004 年发表的《建立具有中国时空特征的理论框架》^[8]一文中，曾经从时间性和空间性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于社会学到底有什么独特意义，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重塑了社会的时空结构，而从社会时空结构又可以更好地解读中国的改革开放，这就是改革开放的社会学意义。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内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国际上意味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都彰显了时间性和空间性特征，不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微观上、在学理上还是实践上，在社会学、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各个层次，都提出了大量极具学术价值的时代性命题，为时空社会学的发展开辟了灿烂前景。

三、时空社会学适应构建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需要

当前，构建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任务非常迫切，在这方面时空社会学可以大显身手。因为学术话语与时空场景关系密切。在欧美场景下，自然会接受二元对立的概念关系，因为那种靠扩张和掠夺富强起来的国家，其发展和崛起过程就是一个取代另一个，在此时空过程中形成的概念和概念关系，讲究的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这种概念和概念关系与中国这样靠包容和互利发展起来的国家以及形成的概念和概念关系，必然有着重大区别。因此，用西方时空场景中形成的概念和概念体系往往很难解释和理解中国时空场景的发展实践。例如，中国在非洲开展的援助和合作，西方就有人怀疑是不是“掠夺资源”？感觉好像是他们熟悉的不过是新式的“殖民主义”；他们也怀疑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难以接受中国提倡的“合作共赢”，很难理解中国声称“不称霸”。因为，在他们的时空场景中没有见识过能占便宜而不占，反而主张“双赢”的，不相信强大了还不想“称霸”的。而按照中国的包容性概念、融通性思维，这些都容易理解。正如在中医的同一个药剂中，可以既有活血的药材，也有止血的药材；既有“补”又有“泄”，讲究的是协调和平衡。而在西方的概念逻辑中，要么“止”要么“活”，要么“补”要么“泄”，讲究的是单一性和排斥性。可见，要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必须着重于时空转换。否则，就会如台湾学者汤志杰所说：“当今通行的学术分析概念……几乎皆源于西方，因此当我们使用这些概念或语汇时，常暗地为西方的观念和认知方式所笼罩而不自知。”^[9]（P337）台湾学者陈其南也指出：“在基本的术语和概念尚未能给予正确的界定和了解之前，即引进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技巧，并无法妥当地掌握到中国社会的本质。”^[10]南开大学王处辉教授早在 2000 年就曾指出：“如果只满足于用中国的社会事实解释西方某些社会学理论及命题，或论证西方某些社会学概念在中国的适用性，那么，中国的社会学将永远处于‘依附’地位。”^[11]（PP. 436—437）

在国外，社会研究的一个重大进展是“空间转向”，这种“转向”并非简单地将过去那种物理情境的时空概念原封不动地拉入社会理论，而是意味着从社会主体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时空的本体论意义，进而将时空的存在理解为社会性的建构，这当然很有意义。而在我国，还应该在此基础上致力于“时空重塑”，这是构建适应中国崛起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必要条件。

当今全球化时代的时空特性，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内在变量。重塑时空观念正是时空社会学的旨趣和优势所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环境是时空伸延的，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环境是时空压缩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以来在时空伸延的环境下发展，因此其发展的基本路径是社会进化；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环境是时空压缩的，要想获得真正的发展，就需要采取超越进化的发展路径。所以，“时空重塑”就是探索在当今时代，如何实现时空压缩与时空延伸的统一。在时空压缩中实现时空延伸，这可能吗？在西方那种“一个取代另一个”的二元对立概念框架里，这自然是难以理解的，但在中国概念思维中，这不仅可以理解，而且在实践上已经行得通。例如，我们提出“新型城镇

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五大发展新理念”、“一带一路发展新战略”等等，这些“新”的共同点，都是“时空结构”的变化，亦即“时空重塑”。就以“新型城镇化”而言，它不仅包括大中小城市的不同空间布局，也包括不同的城乡空间布局。而“新型工业化”则突破了原来意义上的工业内部结构，吸纳了信息技术、互联网等许多新业态。“新型农业现代化”的“新”，就包括“一二三产业融合”，这是产业结构的变化，由单一的变成多元的。“五大发展理念”则把原来处于狭义“发展”之外的“共享”“生态”纳入其中，而将“创新”提升为发展的主要引擎。“一带一路”更是可以改变世界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这些都是“时空重塑”，其中蕴含了概念创新的巨大潜力。

例如，随着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空间的剧烈变化，转型期的城市研究大大增强了“空间意识”，空间不再被简单等同于土地、建筑、景观等，它的政治属性、社会属性日益显现。空间不仅是传统意义上人们居住的一种场所，而且是城市中各种力量成长、重组的重要变量。城市空间重构与社会结构变迁相伴而生，研究城市空间重构是理解城市转型的路径之一。在时间研究方面，例如王宁提出了“压力化生存”概念，而“时间荒”是生活压力的一种体现^[12]。王宁借鉴美国学者斯戈关于“时间荒”的理论，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扩展。他指出，除了斯戈所说的劳动制度和消费主义文化，中国人的“时间荒”还有三个根源：第一，城市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飙升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脱节；第二，制度无效率导致无效时间的大量增加；第三，中国的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使得“时间荒”现象成为一种发展中国家的劳工阶层为全球不平等所付出的代价。

时空社会学的迅速发展表明，社会学作为一个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的学科，响应社会实践的呼唤，紧扣时代主题，是其促进学术发展的根本所在。

四、中国时空研究实现“弯道超车”的可行路径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时空社会学研究晚了许多年，面对新时代新实践的召唤，中国的时空社会学研究能否以及如何实现“弯道超车”？这个问题可以从许多角度去探讨，这里，我想以最近与德国时空社会学研究专家哈尔特穆特·罗萨教授的对

谈为例，从方法论上提出一种可行路径。

德国具有时空研究的优良传统，马克思、韦伯、齐美尔等早就做了经典性研究。在当代，正如“规模”是空间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概念一样，“速度”、“加速”则是时间社会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哈尔特穆特·罗萨教授的“社会加速理论”，在这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卓越见解。这一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所展现的结果就是以加速为首要特征的。加速的原因和作用方式是极其多元化而复杂的，间或相互矛盾。社会加速有三个子领域：技术领域的加速，社会变化的加速和生活节奏的加速。与“加速”相对而言，他还总结了“停滞的五种类型”：自然的速度极限、减速岛、作为功能失调的伴随之物的放缓、有目的的减速、结构上的和文化上的停滞^[13]（PP. 96—107）。罗萨教授的《加速》一书研究了加速的共同作用机制，确定加速过程在现代化背景下的功能、影响范围和重要性以及它的界限和结构，从而解码社会加速中的逻辑。

2017年9月28日，罗萨教授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演讲中，又明确指出：“如果一个社会是以一种动态稳定的模式进行运作，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社会需要系统性地依赖着增长、创新以及加速，才能确保自身结构的再生产、维持社会经济与制度现状——那它便是现代社会。”^②他强调：科技加速、社会加速、生活节奏加速，形成一个加速的循环，这是现代性的一种自我推进机制。

罗萨教授的社会加速理论和他的演讲，符合西方人对现代性的体验。欧洲经过了300多年的加速过程，“社会加速”的现象和特征表现得很明显、很充分，最近几十年增长乏力，一些国家在一定时期出现停滞，“停滞”的症候也暴露得很明显、很充分。继承社会批判理论的传统，罗萨教授在概念上把“加速”和“停滞”鲜明地区分开来，二元对立起来，一方面批判“加速”，认为它必然带来“异化”，一方面批判“停滞”，就这样在理论上纵横捭阖，里外都占理。

但是，中国与德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因而对社会加速和停滞的感觉和经验也不同。中国还处于加速实现现代化的阶段，还属于发展中国家，不发展就是落后，中国近代以来的惨痛经验很深刻。因此，全国人民的最大共识就是要实现民族复兴，人民急切盼望过上富裕的现代生活。一句话：发展要加速。如果我们也一味地批判“加速”，那是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和民意的。

我们既然要加速实现现代化，就不能从概念上纯粹地否定“加速”，但又要防止“加速”的消极后果；同时也不能容忍“停滞”，而是要防止停滞。那么怎么办呢？罗萨教授开出的一剂解决“加速”与“停滞”矛盾的药方是：他区分了两种稳定——适应性稳定与动态（变革性）稳定。他认为，现代社会之前的传统社会，发展速度慢，社会是“适应性稳定”的，现代化的社会是动态（变革性）稳定的。他主张解决“加速”与“停滞”矛盾的可行路径是“重回适应性稳定”，也就是重新回到现代化之前的那种社会“适应性稳定”状态。怎么退回去呢？他提出：1. 去商品化，退出市场机制；2. 普遍实行基本收入制度，认为这“是后增长社会宪法的基石”；3. 取消“不断增加和加速的强制逻辑”，因为这是“必然导致异化的存在模式”；4. 建立“对美好生活的共鸣（共鸣轴）”。以上第一条是现代社会的根本制度，西方国家怎么可能“去掉”？中国正在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怎能“退”得出？第二条，即便在号称“福利国家”的西方发达社会直到现在还实行不了，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人口大国怎么能做到？第三条根本不切实际，因为欧洲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增长乏力，活力不足，正在谋求“增长”，罗萨的药方开反了；第四条是一个美好愿望，愿望虽好，但实现途径何在？这样一个在欧洲都做不到、不切实际的药方怎么可能适用于中国现实？

看来，要解决“加速”与“停滞”的矛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另寻良方。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至今已经保持了39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其中有些年份，年增长率在两位数，是罕见的高速增长，这使得中国在2010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人民在高兴之余，很快认识到快速增长带来的问题和烦恼：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积累和加深；资源耗费，生态破坏、环境恶化；道德下滑、社会失序、人际冷漠，传统断裂。也就是罗萨教授所谈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深刻矛盾。

现实经验使我们认识到社会发展不是越快越好，经济增长不是越快越好，生活节奏也不是越快越好。怎么办？发展要协调、速度要适中，利益要兼顾。所以，我在罗萨教授的“社会加速理论”中，增加两个字：“社会适度加速理论”。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寻求适度加速——既获取“加速”的积极成果，又避免陷入“停滞”。

怎样寻求适度加速？从最近几年的实际经验中我们会有如下的认识。

第一，放弃GDP主义，经济增长不追求越快越好，而是追求适度的增长。当我国的经济增速从2011年开始由2010年的10.6%降到1位数，并呈现逐年下降之势时，许多人担心经济会不会一蹶不振，琢磨着要不要刺激它重新回到高速轨道。可当降到6—7%，进入“新常态”之后，一种新的“大逻辑”展现出来了：中高速的适度增长，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减少经济“泡沫”，防范金融危机；有利于协调经济增长速度与就业/失业率的关系。在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一般认为，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6—7%不会带来过大的就业压力，失业率可以维持在4—5%。特别是中国经济目前处于转型升级阶段，大量的落后产能要被淘汰，过剩产能要大幅压缩，一批“僵尸企业要破产”，势必造成上千万人下岗，处理不好就会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巨大冲击。经济增长速度过急过快不好，过缓过慢也不好，还是适度、适当为好。

第二，社会速度适中，就可以比较从容地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提高满意度。例如，大家都希望加快城镇化步伐，但城镇化速度并不是越快越好，它要与产业发展、就业容量、环境承载力相协调。我国有13亿多人口，到2016年底，我国城镇常住人口比重已经达到57.35%，即使今后每年城镇化率增长一个百分点（最近五年每年增长1.2%），就意味着要有上千万人落户城镇，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欧洲国家。这固然有助于拉动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但也要有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强力支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都必须紧紧跟上。牵涉面如此之广，还是保持一个适当速度为好，以便为协调各方留有回旋余地。

社会速度适中，还有利于防止社会浮躁。要鼓励诚实劳动，不要幻想“一夜暴富”。适度增长，就可以兼顾发展与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从而减少社会矛盾，降低社会紧张度。

第三，适度加速，还有利于统筹推进文化建设，扬清抑浊，改善社会道德风尚，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变革过程中保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联系，防止断裂、失落、无序。继续弘扬孝道，倡导邻里守望相助，以及尊老爱幼、长幼有序、尊师重教等优良传统，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

保持社会安宁。

第四，适度加速，就可以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修复生态，降低雾霾，改善水质；也可以减轻发展对资源、土地等基础条件的压力，安排国土整治，实行休耕休渔，以便恢复地力，保护海洋，保证可持续发展。

第五，适度加速，还可以保证科技发展战略的稳步实施。我们鼓励“万众创业，大众创新”，把创新列为“五大发展新理念”之首，创新被称为“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当然要“加速”，但“加速”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越快越好”。一是科技创新需要大量投资，而国民收入、企业利润总量总是有限的，过多投到了科技研发上，就要相应减少对民生等方面的投入，而各个方面有一个平衡关系，过分向某一方面倾斜，就要顾及倾斜度的问题。而且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科技创新速度与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之间也有一个平衡问题，创新增长过快，大量创新成果停留在论文上，封闭在实验室里，得不到转化和应用，“创新”速度也就难以持续。

总的来看，要做到上述各个方面基本协调，“加速”就应当是适当的。寻求适当的发展速度当然很难，严格地说，适当的发展速度不是固定的“数值”，也不是确定的“点”，可能是一个“区间”。只要保持在一个合适的加速“区间”之内，“加速”就可能避免造成“断裂”，减速也可能不会带来“停滞”。关键是处理好一系列的关系：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投资与消费的关系；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延续传统与文化进步之间的关系；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关系基本协调，发展大体平衡，“加速”就是适度的。

我们现在天天讲“协调推进”、“统筹推进”，讲和谐、均衡、可持续，耳熟了，也就觉得不稀奇、不新鲜了。可是对比那种“加速”与“停滞”的二元对立，或者就“加速”批判“加速”，或者就“停滞”讨论“停滞”的非此即彼的抽象思维，就可以明显感到综合地考虑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因素才是关键的，探寻和把握“社会适度加速”才是难点和重点，耳熟能详的“协调推进”、“统筹

推进”，才是最可行、最管用的，因而也是真正高明的。

“协调推进”、“统筹推进”以及和谐、均衡、可持续，是对中国传统智慧、中国整合性思维的运用和发挥。中庸，适中、中和，过犹不及，是体现中国传统智慧精髓的“中道哲学”，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曾经是支持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法宝，在社会加速的时代也有发挥作用的广阔余地。这种思维与“二元对立”的西方思维在社会加速问题上的不同在于：1. 它坚持从整体上观察和把握社会发展，而不是把社会发展抽象为“加速”和“停滞”两个对立的方面；2. 它致力于从社会发展的各个要素、各个方面的关系和相互联系中展开具体分析，而不是要么片面地分析“加速”，要么片面地分析“停滞”；3. 它通过协调各种因素、调节各种关系，干预实际进程，寻求社会发展的优化效果，而不是居于实际进程之外，做纯粹理性实则消极的“批判”；4. 它把时间一维与空间一维整合起来，构成社会实践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整体联系，而不是把时间和空间看作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分析对象。由于以上四点区别，中国整合性思维能够避免像罗萨教授那样，在加速与停滞的关系上，一方面讲加速是“表面现象”，讲停滞是背后的“真相”，是“深层次”的，又说停滞是从属于加速的，“对于加速而言是第二位的”^[13]（PP. 28—29, P108）这一类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

总之，运用长于综合和贯通的中国整合性思维，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主题，植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实践，抓住创新中国概念、中国命题、中国理论这个关键，我们的时空社会学研究尽管起步较晚，却一定可以实现学术发展的“弯道超车”。

（本文原为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而作，写于2017年4月。后作为参会论文，提交于是年7月在上海大学召开的时空社会学专题讨论会。9—10月间，又根据9月28日作者在华中科技大学与德国哈尔特穆特·罗萨教授对谈的内容以及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对原稿做了补充论证。）

[注 释]

① 这套译丛均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共十本，分别是[法]乔治·古尔维奇著，朱红文、高宁、范璐

璐译：《社会时间的频谱》；[英]查理德·惠普、芭芭拉·亚当、艾达·帕伯里斯编，冯周卓译：《建构时间

——现代组织中的时间与管理》；[美] 罗伯特·戴维·萨克著，黄春芳译：《社会思想中的空间观——一种地理学的视角》；多琳·马西著，梁光严译：《劳动的空间分工：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英] 约翰·哈萨德编，朱红文、李捷译：《时间社会学》；[英] 帕特里克·贝尔特著，陈生梅、摆玉萍译：《时间、自我与社会存在》；[英] 芭芭拉·亚当著，金梦兰译：《时间与理论》；[英] 约翰·厄里著，李冠福译：《全球

复杂性》；德雷克·格利高里、约翰·厄里编，谢礼圣、吕增奎等译：《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赫尔嘉·诺沃特尼著，金梦兰、张网成译：《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该套丛书的主编均为景天魁和朱红文。

② 哈尔特穆特·罗萨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演讲：“动态稳定，社会加速，追求共鸣：新的现代性理论”（2017年9月28日）。

[参考文献]

- [1] 景天魁，何健，邓万春，顾金土. 时空社会学：理论和方法 [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 [2] 景天魁. 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 [J]. 社会学研究，1999，(6).
- [3] 邓志强. 网络时代社会认同的时空转换——基于时空社会学的分析视角 [J]. 人文杂志，2014，(8).
- [4] 王星. 国家、工厂体制与空间营造——外出农民工城市居住选择的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J]. 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5，(6).
- [5] 黄晓星，郑姝莉. 作为道德秩序的空间秩序——资本、信仰与村治交融的村落规划故事 [J]. 社会学研究，2015，(1).
- [6] 马玉娜，顾佳峰. 省际公共养老福利资源配置研究——兼论空间与制度结构的影响 [J]. 社会学研究，2015，(3).
- [7] 李英飞. 资金短缺下市场如何运作——浦镇轻纺产业资金链中的社会时间机制 [J]. 社会学研究，2015，(2).
- [8] 景天魁. 建立具有中国时空特征的理论框架 [N]. 人民日报，2004-10-28.
- [9] 汤志杰. 本土观念史研究刍议：从历史语意与社会结构摸索、建构本土理论的提议 [A]. 邹川雄，苏峰山编. 社会科学本土化之反思与前瞻：庆祝叶启政教授荣退论文集 [C]. 台北：台湾南华大学社会学所，2009.
- [10] 陈其南. 台湾的传统中国社会（订正版）[M]. 台北：允晨出版社，1994.
- [11] 王处辉. 中国社会思想史（下册）[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
- [12] 王宁. 压力化生存——“时间荒”解析 [J]. 山东社会科学，2013，(9).
- [13] [德] 哈尔特穆特·罗萨.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M]. 董璐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The Rise of Spatiotemporal Sociology in China

JING Tian-kui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PRC)

[Abstract] Looking back at the rapid growth of Spatiotemporal Sociology as a newly developing discipline in China at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we can find that the reason of the rise of this discipline is rooted in the necessity of depiction and explanation on the rise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mporality and spatiality, and in the requirement of a general framework to describe and analyze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eanwhile, discourse of Chinese sociology should be constructed on the bases of Time-Space Conversion. Spatiotemporal Sociology in China, on the calling of new era and new practices, through discussion of “Theory of Social Acceleration”, could provide a feasible project to decipher methodologically how China achieve “corner overtaking”.

[Key words] temporality; spatiality; social acceleration; Spatiotemporal Sociology

(责任编辑 岳天明/校对 正圭)